

臺灣社會學刊 第31期
2003年12月 頁1-45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1, December 2003

理事長演講

全球化與後進國家： 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

王振寰*

* 王振寰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2-2003）。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全球化對後進國家的影響，首先，我將指出1980年代之後全球化有利於後進國家的工業化，但是整體而言，他們與先進國之間的所得差距卻在增加。其次，我將討論在後進國家中，東亞國家的表現比其他地區優異，這主要與發展型國家的介入、以及區域經濟的整合和發展有關。第三，我將討論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轉型與先進國家轉變為競爭力國家之間的異同，以及這樣的轉變將會面對哪些新的問題和可能的危機，同時我將簡要的討論在全球化趨勢下台灣經濟發展所遭遇的特殊困境。最後在結論部分我將討論東亞是否可做為其他後進國家發展的模仿對象，並指出雖然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不同，但國家對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的重要性。

關鍵詞：全球化、東亞、後進國家、發展型國家、競爭力國家

全球化已經是當代最重要的現象，它指涉著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跨越國界影響力的急速增長而言（Held et al. 1999）；具體的說，全球化意味著空間限制被時間征服，由於通訊資訊科技的發達，瞬間高速的資訊流動克服了地理的限制，透過電流的傳輸而達到遠方的目的地。全球化因此也是一個時空壓縮的過程（Harvey 1989），或是一個空間與時間分化的過程（Giddens 1990）。由於全球化指涉面向極廣，本文只討論經濟面向的議題。就像很多現象一樣，經濟的全球化有正反兩面，從正面而言，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商品流通、生產網絡和生產力的擴張，有利於全球的整合和經濟的發展，後進國家因此受惠；但從反面而言，這樣的發展卻集中在少數地區和少數人，而惡化既有的全球和社會內的不平等。對後進國而言，不進入全球經濟體系，將被排除於世界經濟之外，而被邊緣化並導致發展的停滯；但在進入全球經濟體中之後，後進國家也可能由於國內生產和科技能力的落後，而無法與先進國家競爭，甚至導致某些產業因此而消失。在1960和70年代，依賴理論曾經倡導關起門來自行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這個選擇在1989年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瓦解之後，已經走到盡頭，顯示了社會主義道路追趕策略的侷限性，因此對後進國而言，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和道路；如何進入全球經濟體而又能在政策上避免全球化所造成的惡果，對當今的後進國而言，將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選擇。在戰後各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現今全球化過程中，東亞的表現相當突出，不論在經濟成長和科技能力的學習上，都有高於其他後進國家的表現，但東亞能做為後進國的模仿對象嗎？

本文的目的在討論三個問題：第一，1980年代之後全球化所造成的正面和反面的現象，我將指出全球化有利於後進國家邁向工業化，但是它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並未減少；而貧富不均的問題，在全球和一國之內都出現惡化的趨勢。其次，我將討論作為後進國的東亞，在發展上的

特殊路徑—發展型國家，以及其特殊的國際政治經濟地理條件，但這些條件在當今的全球化趨勢下，逐漸消失。第三，我將討論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轉型與先進國家轉變為競爭力國家之間的異同，以及這樣的選擇將會面對哪些新的問題和可能的危機，同時我將簡要的討論在全球化趨勢下台灣經濟發展所遭遇的特殊困境。最後在結論部分我將討論東亞是否可做為後進國家發展的模仿對象。

一、全球化與世界發展趨勢

撇開現今理論界對甚麼時候開始全球化的進程以及甚麼是全球化的爭議 (Held et al. 1999; Hirst and Thompson 1996)，¹ 本文基本上認為，197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英美國家福特主義的危機，對內造成經濟重組和去管制化，彈性生產體制逐漸形成；加上電腦資訊革命，使得先進國家跨國公司往外的投資或與代工生產廠商之間能有效快速連結，全球生產網絡因此形成；同時，資金也以空前快速流動的方式，進出全球各地資本市場。這一波的全球化，對世界經濟體系已經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以下說明幾個重要趨勢。

首先，跨國公司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和佔據市場，而大量投資海外和尋求代工廠商，包括開發中國家。這使得跨國生產網絡形成，開發中國家也由於這波的對外投資而受惠，進入全球網絡中。整體而言，先進國

¹ 對於全球化甚麼時候開始，學界的認定十分混亂。有的學者認為人類從來就是到處移動；有的討論東西文明的交流；也有的認為從16世紀之後，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往外殖民才開始；而本文採取的觀點是從1970年代中期之後才開始這波的全球化。雖然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影響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初期，但是「時空壓縮」的現象，只有在通訊和資訊革命之後才成為可能。

家仍然是全球接受外資最多的地區，但從 1980 年代中期之後，所佔比例逐漸減少，而開發中國家則逐漸增多。在開發中國家中，東亞則是受惠於外資投資最多的區域，拉丁美洲居次，而非洲則一直被排除在外（見表一）。

表一 吸收外資狀況表，1986-2001 (%)

區域	1986-1990	1991-1992	1993-1996	1999-2000	2001
已開發國家	82.4	66.5	61.2	60.0	68.4
西歐	36.4	46.0	33.7	51.9	45.7
日本	0.2	1.2	0.3	0.8	0.8
美國	34.6	12.7	21.7	22.6	16.9
開發中國家	17.5	31.2	35.3	17.9	27.9
非洲	1.8	2.2	1.6	0.8	2.3
拉丁美洲	5.0	11.7	12.3	7.9	11.6
亞太地區	10.6	17.4	21.2	9.2	13.9
中歐／東歐	0.1	2.2	3.5	2.0	3.7

資料來源：UNCTAD (2002b: 7)。

第二，由於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將低技術勞動力密集和標準化產品往開發中國家生產，帶動開發中國家快速的工業化和經濟成長，以及在出口工業產品比重上大幅增加。在 1980 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年平均為 2.3%，在 1990 年代則上升到 4.6%，同期已開發國家則分別為 3.0% 和 2.3%。結果是原來巨大的工業化比例差距縮小了。在出口產品上，由於開發中國家的吸收外資和加入全球生產網絡，出口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的比例也逐年升高。1970 到 1999 年間，開發中國家商品出口每年以 12% 速度增長，高於世界平均成長率的 10%，使其貿易量從世界的四分之一提高到大約三分之一。而這改變也出現在其出口產品從以農礦為主，到 1980 年代之後以工業產品為主。在 1990 年代末期，70% 左右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是工業產品，而在 1970 年代這項比例

大約是20%左右。同時，開發中國家工業產品的出口從1980年佔世界市場比例的10.6%升高到1998年的26.5%；產品附加價值在世界市場的比例也在同期從16.6%升高到23.6%。同樣的，東亞的表現也遠比拉丁美洲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為佳（見表二）。

表二 區域與國家工業產品出口結構，1980和1998

區域	經濟體	工業產品出口		產品附加價值	
		1980	佔世界比例 1998	1980	佔世界比例 1998
已開發國家		82.3	70.9	64.5	73.3
開發中國家		10.6	26.5	16.6	23.6
拉丁美洲		1.5	3.5	7.1	6.7
南亞與東亞		6.0	16.9	7.3	14.0
東亞四小龍		5.1	8.9	1.7	4.5
東協四國		0.6	3.6	1.2	2.6
中國		1.1	3.8	3.3	5.8

資料來源：摘自 United Nations (2002: 81)。

第三，相同的，假如以貿易出口結構中工業產品技術密級的程度和比例來看，開發中國家在中、高技術密集工業產品出口比例也從1980年代之後快速上升，顯示其工業化逐漸深化。開發中國家之中、高級技術和科技密集工業產品占出口份額從1980年時的19.8%上升到47.8%，而這在世界出口比例的份量也由同期的46.8%上升到59.8%（見表三）。這個改變，與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有關。據估計，全球出口中，大約有30%的比例是由垂直分工生產網絡的內部交易完成，而這在過去25年間增加了40%的比例（UNCTAD 2002b:63）。

雖然這波的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產生正面的經濟成長和激勵作用，但是整體而言，世界經濟仍然都還是集中在以先進國家為主的經濟體中，包括吸收外資與貿易份額的比例，世界不平均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擴大。首先，2000年全球前十大外人直接投資與對外投資國家均以歐

表三 世界貿易出口結構，1980和1998

產品類型	開發中國家份額比例		世界出口比重	
	1980	1998	1980	1998
初級商品	50.8	19.0	25.7	14.8
勞動力密集和資源 為主工業品	21.8	23.2	14.7	15.0
低技術和科技密集工業品	5.8	7.3	10.1	7.6
中技術和科技密集工業品	8.2	16.8	26.4	29.6
高技術和科技密集工業品	11.6	31.0	20.2	30.2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02: 68)。

美為主。在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國家中，以美國2,811億美元（佔全球外人直接投資總額的22.1%）居冠，前十大外人直接投資國家投資總額合計達9,790億美元，佔全球的77%。在對外投資國家中，以英國的2,498億美元（全球的21.7%）最多，前十大對外投資國佔全球對外投資總額的84.1%（UNCTAD 2001）。2001年商品貿易總額前20名的經濟體（絕大部分為OECD國家），其貿易總額佔全球比重達76.3%，其中美、德、日、法、英維持前5名，佔全球比重四成。而在2002年，整個非洲（南非除外）的出口貿易只佔全球的0.86%，拉丁美洲也只有5.59%而已（UNCTAD 2002b）。

其次，跨國公司的規模在1990年代也巨幅擴張，前100大的銷售總額從1990年的3.2兆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8兆美元（UNCTAD 2002b: 90）。現今全球大約有65,000家跨國公司以及海外附屬子公司850,000家從事跨國生產（UNCTAD 2002b:14）。而這些跨國公司的規模富可敵國，如以銷售總額與國家的生產毛額比較，前200大跨國公司的生產毛額大約等於1999年全世界生產毛額的27.5%。而前50大經濟體（包括國家和公司）中，14個是跨國公司，36個才是國家。但是由於國民生產毛額是疊加的而跨國公司的銷售總額不是如此計算，二者的算法並不

相同，因此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以累加價值（薪資、稅前盈餘、貶值和攤還等）經過重新計算的結果，Exxon石油公司是2000年全球最大公司，在全球「經濟體」中佔第45位，規模大約與智利和巴基斯坦相當。前100大經濟體中，有29個是跨國公司（UNCTAD 2002b: 90），它們絕大部分是已開發國家的公司。

第三，雖然全球的經濟持續成長，但是收入不均的情況卻在惡化之中。已開發國家佔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從1980年的73%增加到1999年的77%，而發展中國家則大致停留在20%左右（United Nations 2002:51）。而在各國國內家戶收入不均的情況上，一般而言，惡化的要比改善的多，表四是一些國家的GINI係數，可看到這樣惡化的狀況。美、日、德、英、法、芬蘭等高收入國家，除法、日之外，GINI係數都呈顯著成長趨勢；其中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最徹底的英美兩國，惡化最嚴重，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GINI係數都達到了40%以上，顯示分配的不均程度已相當高。拉丁美洲的巴西則一直是分配相當不均，1980年代和

表四 一些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和改變%

國家	年度	Gini係數	國家	年度	Gini係數
美國	1980	40.3	芬蘭	1990	20.4
	1997	45.9		1998	24.6
加拿大	1984	26.8	捷克	1980	20.67
	1994	31.5		1992	24.51
英國	1986	32.6	印度	1990	26.69
	1996	40.46		1997	37.8
法國	1989	32.7	日本	1986	29.75
	1995	32.7		1997	30.31
德國	1989	28.1	台灣	1990	32.2
	1998	32.88		2000	32.6
巴西	1985	58.9	中國	1980	33
	1996	60		2000	45.8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0)。

90年代都幾乎維持在60%的極高度不均狀態，而中國在開放之後，則在2000年達到45.8%的高度不均；相對的台灣也呈收入不均惡化的情況，只是還未到高度不均的程度。全球化對世界不平等和各國國內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還有：

- 即使OECD國家的收入持續成長，但分配極為不均。以美國為例，在1979到1997年之間，國民平均生產毛額增加了38%，但中等收入家庭的成長只有9%。絕大部分的成長是集中在最富有階層，其中前1%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40%，是一般家庭的3倍。前1%家庭的收入在1979年是一般家庭的10倍，1997年則增加到23倍（UNDP 2002: 20）。

-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44個國家中的40個，或93%的人口，經濟幾乎面臨停頓的狀況，甚至將近有一半的人口生活水準比1990年還下降（UNDP 2002:17）。世界最富有的前1%人口，其收入是最窮人口57%的總和。美國前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等於全世界最窮人口43%的總和，換言之，美國收入最高的前2千5百萬人相等於世界最窮20億人口的收入。世界最富有的前5%人口的收入是最窮5%人口收入的114倍（UNDP 2002:19）。

- 雖然已開發國家平均國內生產毛額在1960年是開發中國家的21.5倍，到了1995年縮小為14.7倍，到1998年則更縮至6.2倍（Hirono 2001:38）。但它們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絕對值差距卻從1960年的US\$6,767拉大到2000年的US\$24,450。

最後，東亞四小龍的整體經濟表現，不論是經濟成長率，工業產品出口，或是高科技產業出口的面向上，都高於世界平均。這四個國家的出口佔生產毛額的比例都相當高；而在平均國民所得上，東亞四小龍已是高所得國家／地區。重要的趨勢是，從1980年之後，東亞與東南亞內部貿易愈趨緊密，出口比例從過去以先進國家為主，逐漸轉移到區域內

部各國，區域經濟的趨勢逐漸出現。2002年東／南亞國家區域內出口占其總出口比率已增達47.0%。東／南亞區域內出口對各國總出口增加的貢獻率，亦由1986至1990年平均的43.6%，增至1991至2002年平均的53.6%。而其中，中國的崛起更是扮演區域經濟形成的重要觸媒，各國對大陸出口依賴度相應逐年上升。大陸逐漸扮演東亞出口擴張的引擎角色，已逐漸成爲其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經濟建設委員會2003）。東亞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趨勢有：

- 東亞和東南亞貿易版圖快速擴增，其出口占全球總出口比率，已由1991年的22.8%增加至2002年的25.5%，超越北美自由貿易區。目前東亞和東南亞13國的國民生產毛額佔世界生產的比重已經超過20%，區域內貿易總額佔其所有貿易的比重大幅增加：日本達41.3%，台灣爲40.5%，南韓也有35.3%，新加坡則高達52.2%（表五）。

- 大陸積極融入東亞產業分工體系：大陸扮演東亞生產工廠角色，取代日本，成爲東亞國家出口品的主要吸納市場。2002年東亞國家對大陸及香港出口依存度已擴增至18.9%；對日本出口依存度則相對下降。1991至2002年間東亞各國出口擴增，近4成來自大陸及香港，遠較1986至1990年平均的5.5%明顯提升。2002年，大陸及香港對東亞出口擴增的貢獻率更高達62.1%。

- 大陸及香港成爲東亞各國創匯主要來源，其中，台、新、南韓三國合計對大陸及香港貿易順差，1996年已增達406億美元，2002年續增至509億美元。

東亞國家的發展，一直被譽爲模範生，透過出口導向工業化，逐漸提升科技和生產能力，進而提高了經濟成長和國民所得。而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結果，現今東亞／東南亞區域內貿易大量增加，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成功，更帶動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增加，使得過去東亞以

出口工業產品到先進國家的趨勢逐漸改變。而未來的東亞是否持續成長的趨勢，與其技術能力是否提升，以及中國是否能持續發展帶動區域的整合有密切相關。

表五 東亞經濟指標，2000年

國家	GDP 成長率% (1990- 2000 平均)	GDP 平均所得 (美元/ 2000年)	出口佔 GDP 比例%	出口至東亞/ 東南亞/南亞 比例%		工業產品 佔出口 比例%	高科技產 品佔工業 產品出口 比例%
				1980	2000		
日本	1.3	34,691	10.5	28.1	41.3	94	28
台灣	6.4	13,033	50.2	17.7	40.5	98	56
香港	4.0	23,922	137.6	24.4	46.8	95	23
新加坡	7.8	22,026	167.7	41.3	52.2	86	63
南韓	5.7	8,472	45.7	14.4	35.3	91	35
中國	10.3	795	23.4	33.8	33.7	88	19
高收入國家	2.5	27,680	-	-	-	79	22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02)；UNCTAD (2002a)；UNCTAD (2002b)；
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年報》。

二、全球化，東亞發展與發展型國家

東亞在戰後的發展，凸顯了它們與其他後進國家的不同，這個議題已經被廣為討論，也引起社會科學界諸多的爭議。²其中爭議的焦點在於國家的角色。傾向新古典經濟學的論述，大多認為1960年代之後，東亞國家採取自由化措施讓市場機制運作之後，經濟才快速發展。換言之，市場而非政府才是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認為國家扮演重要角色的論述，或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則認為政府的領

² 中文有關的評論請參見鄭為元（1999）。

導角色，更是這些國家之能夠發展的關鍵（Amsden 1985, 1990; Wade 1990; Weiss and Hobson 1995; White 1988）。假如沒有國家的積極干預，市場本身不會造成發展，特別是對幼稚工業和高科技產業，如無國家的扶植，是不可能發展的。這樣的爭論，在世界銀行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蹟」之後，終於告一段落。以鼓吹自由市場的世界銀行在書中亦認為，「我們的看法是在一些少數國家的一些例證中，主要是東北亞，政府的介入導致了高速和比較平等的成長，設非如此，將不可能發生」（World Bank 1993:312, 粗體外加）。

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英美市場模式與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之間的一個國家介入但採取市場經濟的模式。以Johnson（1982）的話來說，這就是「計畫—理性」（plan-rational）的形態而與英美的「市場—理性」（market-rational）類型不同。Johnson指出「市場—理性的國家關心的是經濟競爭的形式和程序……相反的，發展主義或計畫—理性（plan-rational）的國家的主要特質是它有其實質的社會和經濟的目的。在計畫—理性的國家裡，政府給予工業政策最大的優先，也就是關切國內工業的結構，提升其結構以強化該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工業政策的存在本身引涵了對經濟有策略性的和目的導向的作為。而另一方面，市場理性的國家經常並沒有工業政策」（1982:19-20）。也就是計畫理性的國家比市場理性的國家更有意識地介入市場運作，而不只是規劃市場運作規則而已。雖然這樣的論點，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List、Gershenkron等的理論中，但一般而言，Johnson對日本通產省的研究開啓了東亞發展型國家研究的論述（Woo-Cumings 1999），而後續的個案研究，例如Gold（1986）與Wade（1990）對台灣的研究，Amsden（1990）與Woo-Cumings（1991）對南韓的研究，以及諸多對東亞或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例如Haggard（1990）、Deyo（1987）、Evans（1995）、White

(1988)、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Weiss and Hobson (1995) 也都是這樣的架構啓發下，或多或少做些修正，來研究東亞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引導作用。

簡單的說，所謂發展型國家是指國家官僚有意識地將發展視為優先，利用政策工具和能力，將國內稀有資源投入重要產業部門，以提升生產能力和競爭能力而言 (Weiss and Hobson 1995:148)。在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討論裡，國家要能夠有能力決策和執行既定政策，有幾個重要面向：第一，就是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國家官僚體制一方面要具有能力規劃政策，另一方面有效執行這些政策。而這因此依賴幾個因素。其一就是國家的自主性 (state autonomy)：也就是決策官僚能夠拒斥私人利益的影響，而從國家政體長遠的角度來規劃發展政策。這是因為私人或公司比較是從個別和短期角度看待利益，因此假如他們對國家有重大影響，將使得國家失去自主性，而無法中立地從整體長遠角度設定政策。其二，前導性的機構 (pilot agency)，這些機構吸引優秀人才從事計畫、導引不同行動者，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日本的通產省或南韓的經濟企畫院或台灣的美援會、經建會等。這樣的經濟官僚體制相當的一致或具有共識地從事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政策，而較無內在衝突或是這些衝突能夠在形成政策之後一致地執行。其三，這些前導性機構不能只是企畫而已，因為國家政策的一致性，需要有效的協調國家內部各機構以及整合不同行動者的利益 (Chibber 2002)。

一個具有能力的官僚體制，未必是發展主義，它也可能會是掠奪式的；且由於具有高度自主性，因此它也可能將國家資源挪進少數官僚的荷包 (Evans 1995)。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且具有能力的官僚體制，如何可能是發展掛帥？這就是第二個面向：國家的政策。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具有自主性的國家在政策上，是與市場原則搭配而非反市場原則

的。正如 Aoki 等人（1996）指出的，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有動機和能力來吸收和過濾資訊，以擴大私人利益。但是缺乏政府介入，只靠私人利益擴張將產生市場失靈；而國家介入太深，則又會產生國家失靈。因此國家需要以政策引導私人擴張利益和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對此，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東亞的成功，在於國家透過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引導私人資本進入國際市場從事競爭，而不同於拉丁美洲的進口取代工業化，以補貼和保護來發展工業。對於工業政策的執行，發展型國家理論有不同的說法。一個是「服從市場」原則（market conforming），也就是國家的政策引導私人資本到市場去競爭（Johnson 1982）。另一個「市場擴張」原則（market augmentation）（Amsden 1990），也就是以賦稅政策引導私人資本擴張規模和產能。這也就是 Amsden（1990）強調的扭曲市場價格（getting the price wrong），以扶植策略性產業。還有就是 Aoki 等人（1996）說的「強化市場」原則（market enhancing），這個說法認為光是賦稅補貼不足以引導私人資本，因為補貼會造成廠商的尋租行為，因此國家必須有賦稅上的作法來歸訓私人資本。那就是有條件的補貼或有條件的租稅政策（contingent rent），國家透過一些作法，例如出口能力或技術提昇，當廠商達到一定的水準時，國家予以補貼否則予以懲處。最後就是「管理市場」（governed market）原則，這個原則強調國家認為某些產業是長期發展所需，不論私人資本是否願意投資，國家透過各種優惠措施，引導資源投入，來強化整體經濟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Wade 1990）。

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第三個主要面向就是國家與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雖然強調國家自主性的重要性，但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在重大政策制訂和執行上，是透過了特殊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來達成。這也是 Evans（1995）所強調的「鑲嵌式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國家官僚透過了協商委員會（deliberated councils），將具有主導性的官僚組織與私人資本之間制度化的連結起來。國家官僚的自主性以及介入經濟領域，因此與私人資本之間是有所隔離（insulate）但並非孤立（isolate）（Weiss and Hobson 1995）。國家官僚透過了這樣的制度化政策網絡，動員私人資本往策略性工業投資和執行工業政策。Weiss and Hobson（1995）以「管理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來說明這樣的公私合作和制度化的連結。

這樣的發展型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通常是威權主義政治體制。這樣的威權體制，一方面壓制或以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利益代理體制，來管理社會組織，特別是勞工團體。國家之所以具有自主性，與這樣的威權體制，公民社會受到壓制有密切關係，也因為這樣的壓制，工會活動幾乎消失，工資因此受到壓抑，有利於工業產品壓低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也有利於生產秩序（Deyo, 1989）。這樣的威權主義國家，基本上是擁有權力的政客領導，財經官僚行政，而軍人則維持秩序的三位一體體制（Onis 1991）。這一方面使得社會團體被壓抑，無法影響決策，另一方面也維繫了財經官僚的自主性來領導、規訓，以及導引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一般而言，東亞經濟體中，市民社會普遍虛弱，而國家則相當強勢。

總之，發展型國家理論一致認為，國家透過租稅政策，引導稀有資源往策略性產業投資，並規訓私人資本的行為。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因此是選擇性的而非全面性的與私人資本合作，並且透過挑選勝利者處罰失敗者的作法，來管理經濟發展的方向。由於稀有資源有限，因此發展型國家通常透過對銀行或金融體制，分配信用，給予策略性產業長期貸款，而私人資本也在政策和資金的支持下，從事規模擴張和出口，而有利於整體經濟的長期發展。由於東亞國家之間有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政治

結構，因此在發展模式上出現了不同的次類型，例如日本和南韓是以國家之力帶動大型企業發展進而出口，但是台灣和香港卻是以中小企業，而新加坡則是以外資為主；日本與南韓在公私之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台灣的國家與大型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則相對較為疏遠（Haggard 1990; Fields 1995; Whitley 1992）。

對於發展型國家的討論，必須放到歷史脈絡中才能看到國家自主性的緣起；而其後來的經濟發展，也與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有密切相關。首先，發展型國家在政治上大多是威權主義國家，而這基本上是內戰的產物（Cumings 1987; Castells 1992; Onis 1991; Pempel 1999a; Woo-Cumings 1999）。由於內戰之故，這些國家將生存和國家安全視為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例如南韓面對的是北韓而台灣則是中國大陸，香港就在中國旁邊，而新加坡則要面對馬來西亞的威脅。戰爭的威脅一直是國家生存必須面對的重大議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同樣是具有自主性的國家，東亞與其他第三世界地區的國家官僚，並非掠奪性而是發展性的問題（Onis 1991）。對東亞的國家官僚而言，在經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面對虎視眈眈的共產政權，如何維繫國家生存與強化發展，成為對抗共產主義和維繫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因此經濟的自主和對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維持，而非社會福利和民主，成為首要考慮。而在政治逐漸穩定之後，經濟發展逐漸替代國防安全成為維繫正當性的基礎，追趕西方的成長主義，成為國家自主的民族主義在政策上的表現。

其次，這樣的威權體制和發展主義，同樣也是冷戰時期地緣政治的產物（Woo-Cumings 1999; Tsai 1999）。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唯一霸權，在面對共產主義的擴張和威脅，美國極力保衛日本、台灣和南韓，並以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這些國家，和協助這些國家從事土地改革和經濟政策的擬定。對美國而言，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更

重於對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對這些威權政體的支持，更成為冷戰時期美國主要的戰略考量。因此，在1950年代，當這些政權逐漸穩定之後，美國更開放其國內市場，吸收這些國家的工業出口產品，使這些國家能順利進行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並容忍這些國家對國內產業進行保護的措施。相對地，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並無相類似的作法（Cumings 1987; Pempel 1999a）。在美國的支持下，東亞國家建立了威權政府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並使這些國家順利工業化，美國也對這些國家採取了最惠國待遇，而成為這些國家工業出口最主要的市場。因此正如 Onis (1991:117) 指出的，「任何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分析，必須將戰後東亞成長之能夠實現的國際政治脈絡納入考量。」

第三，國際經濟體系在1960年代之後，開始變化而出現新國際分工的局勢，而有利於東亞國家的發展。由於戰後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復甦，激烈的國際競爭使美國公司的獲利能力下降，因此廠商開始尋求海外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由於1960年代，拉丁美洲正處於左派和民粹政權當道時期，而非洲以及其他地區政局也相對不穩定，因此東亞的穩定政治秩序和傳統的儒家倫理，都有利於維持生產秩序和勞資關係，成為美國廠商選擇投資的主要區域。而相對的，東亞國家也在此時期相繼採取有利於國際投資的政策，吸引跨國公司的進駐；或是鼓勵跨國合作，進行全球生產的分工網絡，邁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在進行了一段以簡單加工出口的工業化之後，這些國家又開始採取策略性工業政策（香港除外），以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和扶植特定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提升競爭能力。發展型國家的特質與條件，可總結為表六。

發展型國家因此是一個歷史產物，有特定的歷史條件，包括國家的自主性、有利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和新國際分工的出現等。這些條件，在1980和1990年代之後，在東亞社會中一一消失，國家的領導能

表六 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主要構成質素

面向	因素	描述	測量方式
國家官僚體系	國家自主性 (Johnson) 前導機構 有能力的官員 協調機構	前導性機構具有自主性，政府部門間有內在的一致性 招募有能力和訓練有素的官員進入經濟決策體系 前導性機構從事政策擬定、規劃，並協調不同部門和私人資本來引導經濟發展	政策決定是否受到私有部門利益的影響 內在一致的程度 人員招募是否以能力決定
國家的經濟政策	服從市場原則 (Johnson) 強化市場原則 (Aoki) 擴張市場原則 (Amsden) 管理市場原則 (Wade)	以財稅政策 (政策性貸款、減稅、關稅減免、國內零件優先、外銷沖退稅) 的作法，來鼓勵和推動策略性產業 以有條件租稅誘因的作法，來規訓企業行為，避免尋租行為	國家是否鼓勵策略性產業的政策 是否有能力執行政策 是否有能力規訓私人企業家
國家—企業關係	鑲嵌自主性 (Evans) 管理的互賴 (Weiss and Hobson)	透過公私網絡，制度化的連結政府官員和企業精英	政策制訂是否有制度化的機制連結政府官員和私人資本家
國家—公民社會關係	威權主義的政府 弱勢的公民社會	以國家安全之名，壓制公民自由和人權	國家控制公民社會的程度，透過何種機制
市場取向	出口導向工業化	出口部門成為經濟體中最具活力的推動力來源	出口部門佔 GNP 的比例
正當性	民族主義 國家安全	生存 國家發展 追趕先進國家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型態 國家追求發展的決心
時間因素 國際環境	冷戰時期 國際 / 地緣政治 世界市場的擴張	美國霸權時期 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 美國市場成為出口產品主要銷售地	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

力因此出現與過去不同的挑戰。

首先，東亞國家在1980年代之後，逐漸面對新的政治局勢，南韓和台灣同時進行了雙重的轉型—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使得國家逐漸被社會勢力滲透，而不再具有自主性。由於政客是透過選舉產生，因此政治利益壓力經常使得財經官僚失去決策的自主性和一致性；租稅優惠的辦法，也經常由於政治壓力而擴充至各部門失去鼓勵策略產業和重點培植的意義；更重要的，民主化的結果也將使得公民社會崛起，挑戰威權主義國家，三位一體的政客、財經官僚、與軍人之間的合作和分工也將瓦解。因此，即使財經官僚仍然決策，但是將由於政客的不同考慮而多變，或由於不同社會利益的壓力而失去方向。正如Castells（1992:66）指出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最後終將導致它自己的消亡，及其彌賽亞般夢想的破滅。由它們在血汗中所扶育出來的社會的確已經成為工業化的現代社會」。

其次，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在1980年代中期東歐社會主義政權逐一瓦解之後，正式進入後冷戰時期，蘇聯崩解為數個國家，東西方的敵對狀態不再，成為美國獨霸的局面。在此情況下，美國不再容忍東亞各國的保護政策，而對各國採取不同程度的壓力，東亞各國也在這樣的壓力下，紛紛採取經濟自由化措施，包括開放市場、匯率自由化、和流動資本自由進出市場的政策。在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壓力下，日幣、台幣、和韓圓紛紛升值接進40-60%，迫使東亞各國的廠商外移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以降低生產成本和面對激烈競爭。這也間接使得東亞／東南亞內部分工出現和導致區域經濟逐漸形成。雖然至今為止，美國仍是這些國家工業產品重要的輸出地，但是比重卻日漸降低，區域內部貿易則逐漸重要。而重要的是，國家不再像過去那般能夠保護國內企業的發展，而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的作法。

第三，國際經濟體系也在1980年代之後日漸全球化，一方面跨國公司的全球分工網絡和全球生產網絡日漸形成，尋求有利投資地點或跨國連結成為新的趨勢；另一方面，由於各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使得金融流動愈趨快速。過去外資的型態是以跨國生產性投資（FDI）為主，現今則是以短期的基金進出全球股市，獲取利價差為主。在1990年代初期，每日在全球金融市場出入的金額大約1.4兆美金，而到了2000年則增加到2兆美金（UNCTAD 2002b）。這個數字大於除了美、日、德三國之外所有國家在2000年的全年國民生產毛額總額（台灣是3139億美金）。資金的高速國際流動，對當今全球的上市公司的運作產生了一個重大影響：那就是負責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投資公司，為了讓投資人獲利而大量投資於短期可見利潤的股票；另一方面，公司的運作為了吸引資金，必須在季報上呈現獲利，因此在策略上不再以長期投資為主，而以短期財務報表的亮麗為考慮，因此併購和股票面值的上升，成為主要的利潤操作方式。金融的主導，導致了當今資本主義的短期主義，或Strange（1986）稱之為「賭場資本主義」，對長期工業生產的投資反而較過去短少。由於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得國家控制資本的能力下降，因此也有人認為當前的資本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國家的終結（Ohmae 1990），國家不再有能力控制資本和發展的路徑。

發展型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危機，表現在1997年東南亞／東亞金融風暴的歷程中。此次金融風暴是從泰銖崩盤開始，一連串引發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股市危機和骨牌效應，南韓在1997年底也陷入嚴重危機（Weiss 1999, 2000; Wade 2000; Haggard 2000; Pempel 1999b）。事後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導致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是由於東亞國家過於深入地介入經濟發展，而政商關係的利益糾結，造成了「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更扭曲了市場機制；

而高度負債的公司，由於透過政府的協助而失去危機意識和道德危機，最終使得整體經濟暴露於高度風險中（Pempel 1999b; Haggard 2000）。這樣的解釋部分說明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原因，但是並不能解釋為何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卻相當成功地帶領發展。

真正造成東亞金融風暴形成的原因，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和發展型國家的退位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因此金融風暴的發生，正如 Weiss（1999, 2000）說的，並不是因為國家介入太多，而是太少所致。東南亞國家在 1980 年代採取類似東亞四小龍的作法，以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為主；但是這些國家一方面缺乏類似東亞四小龍的國家自主性，反而是有嚴重的群帶關係，它們也沒有東亞國家的比較有能力的官僚體系和完整的發展計畫。相反的，他們為了吸引資金從事發展，大幅度開放股市給外人投資。結果是進入東南亞各國的資金，很少是直接從事工業生產的外人直接投資（FDI），而是股市基金和熱錢，它們炒作股票和房地產，使得東南亞各國在危機之前，雖然看起來股市欣欣向榮，但是卻已是泡沫化的請況，而充滿危機（Weiss, 2000）。而相對的，南韓的危機，也正是由於發展型國家的快速退位所造成的。南韓的政治自由化結果，使得財閥對政治的影響力大增。金泳三執政期間，在財閥的推動和支持下，國家大力改造並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過去一向主導南韓經濟發展的「經濟企畫院」在 1993 年廢除，而「全球化」則成為國家政策。為了在 1994 年加入 OECD，南韓政府更在 1993 年開始，大幅度開放資本市場。在此新的趨勢下，財閥大力向國際金融機構借貸，以擴張產能進軍世界市場，結果是負債比例遽增；另一方面，國家退出市場的結果，國際投機資金得到到處亂竄熱錢進出股市（Noble and Ravenhill, 2000）。因此南韓的金融危機，並非發展型國家的失敗，而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下，採取新自由主義導致缺乏管制而最終引發了金

融危機。

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台灣相對比較穩定，也是受害較輕的經濟體。與南韓相比，台灣對金融自由化採取的是比較保守的作法，主要原因在於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都對1948-9年的上海金融危機導致其失去大陸有深刻的記憶，因此對於金融開放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對於中國資本可能滲透股市，而造成政治經濟危機有相當的戒心，因此即使在美國壓力下，雖然逐漸開放資本市場，但是都採取謹慎和過濾的方式，而非全面開放（Chu 1999；許嘉棟，1999）。在此情況下，台灣資本市場未與全球完全連結（外資在1997年股市的比例只佔市值的3%而已），加上保守的金融政策導致的巨額外匯存底，使得台灣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中，得以成爲特例。

因此，整體而言，發展型國家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加上國家的自主性、大力扶植產業、和出口導向策略等，使其在戰後的數十年能利用國際資本主義擴張的機會順利的工業化。但在當今新的全球資本主義下，東亞國家已經面臨不同於以往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國家不太能像過去那般的介入國內產業發展，而必需不斷的自由化和採取開放的政策。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國家將要以何種方式創造投資環境吸引國際資金，以及提升產業發展和科技能力，是當今東亞國家和所有後進國家所面對的難題。

三、全球化下東亞國家的抉擇——競爭力國家？

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趨勢下，國家失去了引導發展的動力了嗎？發展型國家終結了嗎？還是它以新的型態出現？而出現新的類型，又會有甚麼社會效果？

在後福特主義時期，西方先進國家紛紛放棄了福利國家制度，而採取了強調彈性和有利於創新體制的競爭力國家體制。³過去福特主義時期的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the Keynesian welfare state），強調的需求面經濟，透過政策來創造完全就業和保障勞工福利，以帶動需求來刺激生產和創造經濟積累的良好循環；現今的後福特主義時期是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the S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強調的是供給面經濟，在經濟政策上它著重創新和結構的競爭力；在社會政策上，則強化彈性和工作訓練而非福利（Jessop 1994）。整體而言，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強調的是競爭而非保障，是工作（workfare）而非福利（welfare），是創新而非就業，是彈性而非管制，是以企業而非勞工需求為主要考量。在此原則下，原來的福利措施大量刪減，國營事業大量私有化，而為了增加組織彈性，很多原來是公有部門的工作，例如都市建設和福利機構，紛紛採取半公半私的新型態組織「廣構」（quango--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來從事，這些組織並非政府組織卻是從事政府的工作，其工作人員和領導由政府部門派任，卻不必受到議會的監督。

在強調競爭力和創新上，熊彼得式工作國家所著重的和依賴的是知識經濟導向的政策，亦即將知識視為資本和原料，成為利潤的來源。低廉的勞動力已經不再具有競爭能力，腦力才是。知識和資訊取代了勞動力，成為價值的來源，知識因此商品化，也成為資本積累的動力。但由於知識和資訊不像勞動力可由勞動時間來計算價值，知識的本質是流動和可學習的，因此國家一方面不斷在政策上鼓勵創新，另一方面則為維護知識的價值，因而在法律體系強調「知識財產權」以便維護知識做為商

³ 中文文獻有關福利國家轉變到競爭力國家的討論，請參見呂建德（2001）。

品的壟斷租金 (Jessop 2000)。爲了推動知識的創新，「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成爲各國科技和產業政策的發展重點 (Lundvall 1992; Nelson 1993; OECD 1999)，企圖透過建構產官學的合作，重新改造教育體系，將高等教育人力與產業創新結合，深化創新能力。在這國家創新體系的預設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同樣重要，因爲知識是鑲嵌在人力中，因此強調創新的教育內涵必須建立；另一方面，創新經常來自團隊合作、信任和經常的互動，因此建立鬆散而又有合作關係的網絡文化，成爲重點 (Amin and Thrift 1994; Johnson 1992; Saxenian 1994)。矽谷的產官學創新文化和網絡式組織，成爲各國建構國家創新體系的學習對象，現今各國重點大學紛紛成立「育程中心」(incubator) 也是受到史丹福大學與矽谷廠商合作成功之後所啓發形成的。

這樣的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型態，與強調國家帶動發展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有何不同？二者都強調國家對經濟的介入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也都強調工作而非福利，更強調透過政策來導引發展，因此在強調發展上，相當類似。⁴但在以下四個制度面向上，這兩種類型的國家有所不同：

第一，在國家介入經濟的方式上，熊彼得式的國家強調的是提供供給面的有利條件，而發展型國家則是積極介入產業發展的方向。在這點上，前面 Johnson (1982) 的「市場—理性」與「計畫—理性」的區分已經可以說明清楚。亦即，前者並沒有策略性產業政策，而是以提供優

⁴ Jessop (1994) 區分三種類型的新熊彼得式工作國家—新自由主義、新統合主義、和新國家主義 (neo-statist) 三種，這些與個別國家的制度傳統和政治勢力的均衡有關。不過這些討論主要針對先進國家的轉型，而非對後進國家。

惠條件，鼓勵創新。後者則是訂定發展策略性產業政策，並以輔導、介入、關稅優惠等措施，來扶植策略性產業的發展。因此，前者是往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的方向，強調供給市場條件，讓企業自行發展；而後者則是發展主義取向，以國家之力系統性和策略性的導引發展方向（Storper 1997:285）。

第二，在科技政策上，熊彼得式工作國家強調的是往科技前緣的領域發展，鼓勵創新，以創造技術租金；而發展型國家則由於科技較為落後，因此強調的則是學習先進國家。先進國家的科技發展路徑，一般而言，是從路徑和成果都不確定的研發開始，逐漸有了成果之後開始少量技術生產，等到技術成熟知識普及之後，生產成本成爲主要競爭條件時，才開始大量生產或開始外移（Hobday 1995）。在研發的階段，由於不確定，因此需要大量人力和資金的投入，甚至爲了降低風險和集結資金，而形成跨國合作（Simon and Koppel 1995）。而各國爲了強化創新，因此也積極建構國家創新系統來強化知識的創新（Archubugi and Iammarino 1999; OECD 1999）。相對的，發展型國家的科技政策基本上是去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消化既有知識之後，才逐漸邁向創新（Hobday 1995; Mathews and Cho 2000; Lee and Lim 2001; Kim 1997; Kim and Nelson 2000; Lall 2000; Viotti 2002），其路徑與先進國家相反，是反向工程的學習。因此，基本上後進國的科技體制基本上還不是「國家創新系統」，比較適合的名詞應該是「國家學習系統」（Mathew and Cho 2000），其強調的是學習和改善既有科技，而非創新的能力，將先進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科技透過學習和購買專利、技術合作等，逐步深化知識和研發，最終達到科技創新的可能性。南韓和台灣在此方面，特別是資訊科技的發展上，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im, 1997; Lall, 2000; Mathew and Cho 2000; Kim and Nelson 2000；吳思華、沈榮欽 1999；王

振寰 1999；王振寰、高士欽 2000；陳東升 2003）。

第三，在金融體制上，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是以資本市場的運作，來鼓勵創新。而發展型國家則是透過銀行體系的資金來支援創新和學習。由於創新科技屬於高風險但也是高獲利的產業，一般商業銀行基於風險和謹慎的考量，較不敢投入。因此有創投資本（venture capital）的發明，在資本市場上匯集資金，投入創新產業和企業，等到該企業穩定發展之後，才上市匯集更多資本擴大生產。因此熊彼得式工作國家主要的作法，是維護資本市場的規範和支持金融創新，來鼓勵新知識和技術的開發（Aglietta 2000; Boyer 2000）。而發展型國家則長期以來是透過國營銀行的優惠貸款，引導和帶領高科技產業發展。一方面，由於銀行是國營，因此國家可以以其行政手段要求銀行配合；另一方面，由於高科技在這些國家已不具備高風險的特質（因為這些技術和產業已經在西方先進國家有一定的發展程度），因此在經過一定的評估程序之後，才積極從事發展特定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型國家對金融工具的操作，有效的運用了國內資金，投入在高科技產業上，也帶動了產業的轉型（Zysman 1983; Dore 2000）。雖然南韓和台灣也都學習歐美的創投資金，投入創新為主的科技產業，但整體而言，它們所佔的份量仍小，銀行貸款仍是最大的資金來源。以台灣為例，在 2001 年的金融市場中，直接金融（股市、債券）與間接金融（銀行）的比例約 3：7，而美國是 6：4，亦即台灣的企業融資至今為止，仍以銀行借貸為主要的方式（財政部 2002）。另外，南韓的例子也類似（蔡增家 1999），南韓企業的外部資金來源中，以銀行借款、借用外債和政府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在 1970-80 年代占 80%，1985-1994 年仍占 60% 左右；直接融資中，股票籌資在 1970-80 年代不足 14%，1990-1994 年也僅為 15.9%。

第四，在空間範疇（scale）上，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基本上是一個

以全球為空間範疇的模式，而發展型國家則仍是以民族國家為範疇。後福特主義時期的資本積累已經不再以民族國家範圍為界線，而是愈來愈以全球市場為基，包括生產網絡、科技創新和金融流動，都以全球為單位，因此民族國家的統理方式，將面對統理範疇上的典範轉移。這當然不意味民族國家已經終結，而是指民族國家的功能，在某些面向上，是不斷的往區域聯盟或跨國組織移動（例如歐盟）；而在另一些面向上，則是往下分權，例如地方政府的跨國化（Jessop 1994）。國家的「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成為當今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特色（Brenner 1998, 1999），它成為連結全球、國家與地方的橋樑和中介，並以強化本地不可移動的競爭因素，例如人力和軟硬體基本建設，來強化對外資的吸引力和競爭力。然而正因為如此，資本積累的動力也就不再是國家所能操控。相對的，發展型國家基本上是在本國領土內進行積累條件的操控和提升，以強化科技學習和帶領發展。一方面，國家積極介入產業發展領域，另一方面透過金融體制來帶動策略性工業的成長。操控國內的生產條件和要素，是發展型國家的主要作為，雖然吸引外資是其政策重點，但是重要的是如何將其置於其發展策略下，成為成長的動力。

因此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與發展型國家有所不同，前者是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產物，是先進國家在福特主義危機之後，出現的以競爭力和創新為施政主軸的國家類型；而發展型國家則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是後進國家為了追趕先進國家，積極動員資源，強化學習西方科技，並介入生產領域的國家類型。然而這二類型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在經濟發展目的上相當類似。因此，我們也觀察到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在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1990年代之後逐漸邁向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類型。也就是，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措施、維持福利制度的最低標準、強調科技學習和創新、逐漸放寬金融管制、並積極推動知識經濟。東亞的發展型國家

正面臨新的典範轉型。

東亞國家的轉型，如前所述，一方面出於被外在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所逼，例如美國的壓力、以及中國和東南亞相繼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使其產品失去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由於國內政治環境改變使其產業逐漸外移尋求低生產成本，而必須調整經濟發展策略所致。當生產要素之人力和土地成本失去比較利益優勢，提升科技水準和產品的附加價值，以及發展高附加價值的服務產業，成為必須的選擇。因此在此環境下，我們觀察到台灣開始有「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取代「獎勵出口條例」，以及提出六項新的高科技產業作為新經濟發展核心產業，之後這些計畫總歸為「綠色矽島計畫」；南韓有「全球化」的國家策略，「21世紀韓國網路發展計畫」(Cyber Korea 21)，和「資訊科技發展五年計畫」等；而新加坡也推出「IT 2000」、「Industry 21」和「Singapore One」等計畫，強化資訊建設和全球連結，以資訊、生命科技、媒體等產業帶動知識經濟的發展(OECD 2000)。

東亞國家的典範轉移，因此是逐漸從強調以勞動力便宜為競爭優勢的傳統生產製造業，邁向科技和創新為導向的知識經濟。雖然它們一方面強調在制度面向上放鬆管制，以吸引外資；但在誘導產業發展上，其發展的方式也與過去國家主導的路徑相當類似，國家在其中仍扮演領導的角色(有國家型的主導計畫)，企圖透過國家資源的投入，追趕西方先進國家。與過去不同的是，在國內這樣的主導力量由於民主化的關係，未必能像過去那般有效；而在國際環境上，則面臨來自其他國家對其介入產業的指控，因此這樣的典範轉移是否能像過去一樣順利，而其發展的路徑依賴影響力是否會造成其典範轉移的困難，是一個需要觀察的重要議題。但不論如何，東亞國家在典範轉移之時，與西方先進國家最近的發展類似，都同樣面臨以下的內在矛盾趨勢：

首先，國家並不具備足夠的能力來駕馭高度流動和不穩定的知識經濟。知識經濟是基於全球流動的知識和資訊，不穩定和鑲嵌於虛擬空間是其特色。然而國家的發展策略，就是企圖要將虛擬的空間和不穩定性具體化和穩定化到具體空間和穩定的制度中，成為生產力（Jessop 2000）。也因此，各國在知識經濟的建構上，不斷強調「制度的濃度」（Amin and Thrift 1994），鑲嵌性和制度學習（Johnson 1992; Morgan 1997），以便將流動的資訊和知識固定化。然而與過去的資本不同，知識和資訊的高度流動性，經常使得國家計畫無法精確掌握，也可能使得計畫和與落實之間產生巨大落差，例如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因為兩岸關係的不明，而胎死腹中；南韓的全球化計畫，因為東亞金融危機而中斷；馬來西亞的科技走廊計畫，同樣也因為金融危機以及之後中國的崛起，使其欲成為帶領東南亞經濟區域的中心的發展策略受到嚴重挫折。

其次，強調競爭力的結果，國家愈來愈成為資本的俘虜。為了吸引投資和強化創新，國家本身變成企業家，追求發展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各項主要的政策，大多圍繞如何強化吸引投資和提升創新的條件。而資本家也反過來利用國家之間競爭的機會，討價還價，壓迫各國接受其投資條件，以強化吸引投資和發展的競爭力。當今的國家關心「競爭力排名」更甚於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持。而民主社會中的正當性和公平性，由於工會和各種自主性組織勢力的衰微，更無法對抗全球化趨勢下的新自由主義作為。

第三，與前面相關的是，競爭力國家推動的知識經濟，加上福利的縮減，將造成二元對立嚴重的社會。由於以體力為主的勞動力已經不具競爭力，取代的是腦力；只具體力而不具知識和全球化能力的群體，將被知識經濟淘汰。前面的全球化資料已經說明了即使在先進國家，貧富差距比過去嚴重許多，而在發展中國家，亦是如此。對正在面臨產業轉

型的東亞國家而言，於於產業外移，簡單加工出口工業化時期的體力勞工，已成失業的主要群體。由於這些國家過去只注重發展，並未有完整的福利政策，在轉型為知識經濟之時，社會的二元化將比先進國家更為嚴峻。

台灣近年來的發展情況可作為說明。從1990年代初期通過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期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甚至2000年民進黨政府的「全球運籌中心」、「綠色矽島計畫」，都是朝向鼓勵創新產業和建立區域中心角色的新策略，以提升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和國際資本的投資的計畫。這些表面上看起來仍然類似發展型國家的作法，由於沒有過去那樣的執行和落實能力，使得國家愈來愈像企業式政府一鼓勵而非介入產業的發展。在全球化年代，台灣近年來的政治經濟轉型，卻與先進國家有著相當不同的路徑，也與其他東亞國家，更有著不同的地緣政治條件，因此出現比這些國家了更為複雜的轉型難局。

首先，由於台灣的民主化的關係，國家的發展策略，無法像過去那般的有效（參見王振寰、蘇耀昌2002）。國家雖然宣稱要扶植日出的高科技產業，也採取大幅免稅措施和投入大批資金來支援，但是由於政治壓力的關係，其他產業（例如房地產業和傳統製造業）也都要求比照辦理。以致於在政策上原來優先鼓勵和支持的產業，變成了支持的項目之一。而這使得發展和鼓勵的產業類型失去優先順序，甚至更造成了由於大量的優惠，而導致稅基大量流失。同時，也由於民主化的關係，台灣的福利措施並不像西方國家那般呈現減少的趨勢，而是出現快速的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從1991年979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760億元，其佔政府總支出的比例也從11.9%，上升到21.2%，社會福利預算在2001年首度超過國防預算的13.5%（財政部2002）。而這個增加主要是由於選舉競爭所導致，缺乏理性討論和財務規劃，以致於福利的增加並非流到

最需要支持的弱勢族群。以近三年的預算來看，身心障礙者的預算，從2001年的61億下降到2003年度的55億；兒童、青少年、婦女福利預算從65.9億下降到59.9億；而老年相關預算則從22億成長到220億，增加了10倍，這與選舉中的老人／老農津貼有關（陳雅蕙2003）。稅收的流失，加上福利支出的增加，使得台灣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大幅增加，而導致嚴重的財政危機。中央政府債務餘額佔總支出的比例，由1990年的27.7%增加到2001年的158.3%，而其佔GNP的比例亦由1990年的4.8%到2001年的25.3%，政府負債的情況增加快速，財務情況惡化嚴重（財政部2002）。

台灣的國家轉型與東亞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地緣政治條件的限制，也就是台灣在經濟上逐漸與中國整合，但是政治上卻是愈來愈對立。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帶出了「邁向新國家」的衝動（王振寰、錢永祥1995），而這個趨勢在民進黨執政之後，更為明顯，去中國化和台灣化的趨勢，使得兩岸政治之間充滿緊張。但是在經濟上，台灣經濟卻不斷與中國大陸整合。台灣經濟與大陸的整合可由以下得到說明：首先，台灣的主要出口市場已經從美國變成中國大陸。在1985年，美國佔台灣全部出口總額的48%，但到了2002年末，已經下降到20%。而中國市場則從同期的9%上升到31%（經濟部國貿局2003）。中國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其次，中國大陸也是台灣對外投資最主要國家。直到2001年底為止，大陸吸收了台灣官方批准的對外投資總額的42%（經濟部投審會2002）。而眾所周知，很多廠商是透過第三地投資中國，因此實際數字應高於此。第三，台灣的貿易從中國市場中賺取大量盈餘，在2000年，台灣從大陸貿易盈餘大於整體貿易盈餘的226%，也就是說，沒有與中國的貿易，台灣是貿易赤字國家，而這個趨勢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就是如次。從現有的趨勢來看，未來台灣在經濟上的進一步發展，必然需要

利用中國市場，但是兩岸政治上的對立，對這樣的經濟整合趨勢卻是個拉力而非推動力。外資逐漸不再投資台灣，以及現有外資逐漸撤出台灣而移轉大陸，已經說明了這樣的不利狀況。

因此，台灣在全球化的年代，經濟上是愈來愈全球化與區域化，但是政治上卻是愈來愈本土化和民族國家化。西方的熊彼得式國家的「再領土化」是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或成爲所謂的後民族國家類型（post-nation state），其統理範疇是從民族國家往全球移轉，要積極面對全球快速移動的資本、人力和科技。但台灣正好相反，我們的政治發展趨勢基本上是返回和重建新的民族國家之外，還要將已經逐漸全球化的經濟拉回民族國家的統理範疇內加以管束（Wang forthcoming）。因此，台灣版本的熊彼得式的國家，是一個自我矛盾的組合，也將面對比西方國家更加嚴峻的挑戰。

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正在轉型，而相關的制度和作爲也在轉變，在邁向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時，過去相對平等的社會正在走向盡頭。這也是東亞國家擁抱全球化，追趕西方先進國家，所付出的代價。如何面對追趕和公平的兩難，將會是東亞國家困難的選擇。

五、結論——東亞可做爲其他後進國的學習對象嗎？

本文所討論的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後進國家的處境和困難。我指出了全球化有利於後進國家的工業化，但是其與先進國之間的差距卻未必減少。而在後進國家中，東亞國家的表現比其他地區優異，這主要與發展型國家的介入、以及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有利於區域經濟的整合和發展有關。然而東亞的發展型國家（特別是台灣與南韓）在現今國際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以及國內政治民主化的雙重壓力下，使得傳統上國家積

極介入發展的政策和作為，愈來愈失去效用。現今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愈來愈像西方先進國家的走向—邁向企業式的競爭力國家，或是熊彼得式的工作國家。然而這樣的轉變，將面對與先進國家所出現的國家成為資本的俘虜、嚴重不均、和國家無法駕馭知識經濟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現象。

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是否可以做為其他後進國家的學習對象？有關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持正面和負面的意見都有。持負面意見的人認為從歷史的發展條件（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來看，其他後進國家想要複製東亞的經驗似乎是有困難；而持正面意見的則認為後進國家由於資源缺乏，因此學習東亞國家的作法，透過國家之力來扶植經濟是必要的。在此不再重複這些論證，以下本文根據表六的發展型國家的主要構成因素，將它們置於全球化環境下來討論，以說明後進國家所面對的抉擇，而這些將都指出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下，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首先，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方面，現今的全球化已經造成了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後進國家是否能利用此國際分工和區域經濟形成的機會，來進行工業化和進行出口是很重要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在1960、70年代的發展，就是在美國資本主義擴張並吸收東亞工業貿易產品的情況下進行的。而現今的全球化環境有利於後進國家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因此，後進國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並非沒有機會追趕，只是其國家是否有足夠能力吸引投資並帶動發展，就構成重要的因素。國際資本不會胡亂投資，而是到其信任和有利潤的制度環境投資，國家的能力和制度設計因此是很重要的。

其次，在經濟政策上，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介入仍然必要，鼓勵私人企業發展、扶植策略性產業、並以財稅優惠吸引國內外資本投資是進行追趕型工業化的必要作法。缺乏了這些政策，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後

進國不是無法工業化，就是淪為先進國的工業附庸。後進國家因而必須提升科技和技術能力，才能在國際市場上面對競爭。而這個技術學習對後進國家而言並不能只靠廠商，因為後進國廠商的規模和技術能力有限，因而更需要的是國家的介入，包括公共研發單位和大學等的幫助，來加快學習的步伐和提昇技術能力。從此角度，全球化造成資金的流竄，對缺乏資金的後進國而言，利用外資是重要的作法。但是東南亞金融風暴的例子說明了，吸引的外資假如只是進入資本市場的熱錢，而非投入生產的投資，對後進國而言，經常造成更大的傷害。因此後進國家需要吸引的是投入生產的外資，一方面創造就業，另一方面則學習和移轉技術來加速科技發展。

第三，在國家與企業的關係面向上，東亞的發展型國家過去的做法，主要是透過了制度和私人關係網絡，連結政府與企業，並由政府領導來引導發展。西方先進國家最近大力提倡的「國家創新系統」表明了它們認清了國家與廠商合作在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對知識經濟的提升作用。在這點上，國家創新體系的做法其實與發展型國家有些類似。但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主要是透過制度設計，期能在教育、研發、和企業的創新需求上結合，達到綜合效果。而東亞國家則經常夾雜制度和私人人際關係網絡，而落入群帶資本主義的現象中，如何設計制度網絡而不掉入群帶關係，是後進國家必須處理和面對的問題。而這就涉及到了國家官僚體系的議題。

第四，有關國家官僚體系的能力是一個困難的議題，因為這涉及到政治權力關係，也與各國的歷史發展有關。很多後進國家其實也都看到東亞國家的快速發展，而欲學習其發展方式，但卻陷於國內政治環境而無法有效學習（例如馬來西亞在1980年代之後快速發展，但同一區域的菲律賓和印尼卻陷於困境，都與國內政治環境有關）。因此對於這點，

我們只能存而不論。

以上這些綱要性的提法，指出了後進國是可以學習東亞發展模式，並利用全球化的環境來提升工業化。日本和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歷史，已經指出了後進國並不像依賴理論所說的在世界體系之內已無發展機會，重要的應該是各國家如何抓住機會，進行工業化和技術學習。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和歷史，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模式，但是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應該是無庸置疑的。而這也是東亞可以提供其他後進國家最基本的意義。

作者簡介

王振寰，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是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東亞資本主義。近年來從事的研究包括有關東亞金融體制、科技學習體制、以及政治經濟轉型的議題。

參考書目

- 王振寰，1999，〈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建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69-112。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7-56。
- 王振寰、高士欽，2000，〈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台灣社會學刊》24:179-237。
- 王振寰與蘇耀昌，2002，〈發展型國家興衰的不同途徑：台灣與香港比較〉，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12月14-15日，東海大學社會系主辦。
- 吳思華、沈榮欽，1999，〈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形成與發展〉。頁57-150，收錄於蔡敦浩編，《管理資本在台灣》。台北：遠流。
- 呂建德（2001）〈從福利國家到競爭式國家？全球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
《台灣社會學》2:263-313。
- 財政部，2002，《中華民國財政統計年報／民國九十年》，取自
http://www.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Year_Fin/90。
- 許嘉棟，1999，〈開放資本自由移動之影響與因應〉。《中央銀行季刊》
21(4):23-36。
-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台北：群學。
- 陳雅蕙，2003，〈資源錯置，善事變壞事〉。《天下雜誌》283:176-7。
- 經濟建設委員會，2003，〈東亞經貿整合趨勢與台灣角色〉，新聞稿，
9月22日，台北。

經濟部投審會，2002，《中華民國歷年核准華僑及外國人投資統計年報》。經濟部投審會編印。

經濟部國貿局，2003，《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取自 http://www.moeaboft.gov.tw/stat/stat_index.htm。

經濟部統計處（歷年），《經濟統計年報》，台北：經濟部。

蔡增家，1999，〈信用分配至度的轉變對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影響—日本與南韓之比較〉。《問題與研究》38:61-87。

鄭為元，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1-68。

Aglietta, M., 2000, "Shareholder valu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ome tricky ques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146-159

Amin, A. and N. Thrift, 1994, "Living in the Global." Pp.1-22 i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A. Amin and N. Thrif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78-106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 1990, *Asia's Next Gian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oki, M., H. K. Kim and M. Okuno-Fujiwara, 1996, "Beyo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troducing the market-enhancing view." Pp.1-37 i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M. Aoki, H. K. Kim and M. Okuno-Fujiwar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ppelbaum, R. and J. Henderson, eds., 1992,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 Archubugi, D. and S. Iammarino, 1999,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28(3):17-336.
- Boyer, R., 2000, "Is a financial-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111-145.
- Brenner, N., 1998,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1-37.
- Brenner, N., 1999,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z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36(3):431-451.
- Castells, M., 1992,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p.33-70 in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edited by R. Appelbaum and J. Herders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Chibber, V., 2002,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4):951-89.
- Chu, Y. H., (朱雲漢), 1999, "Surviving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storm: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resilience." Pp.184-202 in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edited by T. J. Pemp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 1987,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Pp.136-164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ited by F. Dey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yo, F.,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yo, F.,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re, R., 2000,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elds, K., 1995, *Enterprise and the State in Korea and Taiw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ld, T.,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Y: M.E.Sharpe
- Haggard, S.,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 Held, D., A.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鈴譯，2001，《全球化大轉變》。台北：韋伯文化。)
- Hirono, R., 2001, "Globaliz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 blessing or threa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Pacific Review* 8(2):28-46.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London: Polity.

- Hobday, Michael, 1995,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 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 Kim, L. S. and R. Nelson, eds., 2000,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ssop, B., 1994, "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 Pp.251-279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 Amia. Oxford: Blackwell.
- Jessop, B., 2000, "The state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 From Bob Jessop's website: 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soc044j.html
- Johnson, B., 1992, "Institutional learning." Pp.23-44 in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edited by B. A. Lundvall. NY: Pinter.
-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 L. S., 1997,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劉小梅、劉鴻基譯，2000，〈模仿是爲了創新——南韓經驗：技術學習的典範〉。台北：遠流。)
- Lall, S., 2000,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sia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p.13-68 in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edited by L. S. Kim and R. Nel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K. and C. Lim, 2001, "Technological regimes, catching-up and

- leapfrogging: 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industries.” *Research Policy* 30: 459-483.
- Lundvall, B. A., ed., 1992,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NY: Pinter.
- Mathews, John and D. S. Cho, 2000, *Tiger Technology: the Creation of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K., 1997,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 31(5):491-503.
- Nelson, R.,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ble, G. W. and J. Ravenhill, 2000,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Korea, Taiwan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p.80-107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Global Finance*, edited by G. W. Noble and J. Ravenh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ECD, 1999, *Managing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ECD, Paris.
- OECD, 2000,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in Asia*. OECD, Paris.
-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London: Fontana.
- Onis, Z., 1991,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24(1):109-126.
- Pempel, T. J., 1999a, “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Pp.137-181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dited by M. Woo-Cuming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ed., 1999b,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New

-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xienian, A. L.,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D. and B. Koppel, 1995, "From interdependence to globaliza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3-27 in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the Pacific Rim*, edited by D. Simon. London: Routledge.
-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Y: The Guilford Press.
- Strange, S., 1986,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 Tsai, M. C., (蔡明璋), 1999, "Geopolitics,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in Taiwa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1(3):101-109.
- UNCTAD, 200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NY and Geneva.
- UNCTAD, 2002a,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2*. NY and Geneva.
- UNCTAD, 2002b,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Y and Geneva.
- United Nations, 200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Pari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0, *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2000*.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Viotti, E., 2002, "National learning systems: a new approach on

-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nd evidences from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South Kore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9: 653-680.
-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 2000, “Wheels within wheels: rethinking the Asian crisis and the Asian model.”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85-115.
- Wang, J. H., (王振寰), forthcoming, “World city formation, geo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al process: Taipei’s ambiguou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1).
- Weiss, L., 1999, “State power and the Asian cri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 4(3):317-42.
- Weiss, L., 2000,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 adapting, dismantling, innovating, not ‘normalization.’” *Pacific Review* 13(1): 21-55.
- Weiss, L. and J. Hobson, 1995,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Polity.
- White, G., ed., 1988,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NY: St. Martin.
- Whitley, R., 1992,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London: Sage.
- Woo-Cumings, M., 1991, *Race to the Swift: The Role of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oo-Cumings, M.,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Pp.1-31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dited by M. Woo-Cum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A World Bank Policy Report*. Washington: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Paris.

Zysman, John, 1983, *Government, Market,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lobalization and Latecomers: Implic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and Its Transition

Jenn-Hwa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irst, I will show that the globalization tendency since 1980 has benefi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the overall gap of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been enlarg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econd, I will show that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performed better than others in the categor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wing to the invol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to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ird, I will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as compared to the competitive state of the advanced countries that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constraints and crisis tendencies in the new global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I will use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se tendencies. Finally, I will show that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can be an exampl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learn, given that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from one that had nurtured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s to emerge in the earlier period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ast Asia, latecomer,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etitive state